

问题，又要严格既有的专业化科学方向作出自己扎实的学术研究，以总体问题的角度带动专业研究，再以专业研究的理论突破彰显总体问题的文明意涵，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根本进路。

3. 从大学教育入手，在社会科学的专门化教育中植入人文教育的要素，并将与中国经验现实有关的理论和实践课程制度化，尽快制定专门研讨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的课程计划。所有这些都旨在建立人心与社会、文明传统与社会现实的思想纽带，用文明总精神和国家总精神来统领社会科学研究的取向和命脉。

中国社会科学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明的自觉承担，是中国的文明传统和现实经验交给我们的命运和使命。一个人或一个文明，倘没有文化的自觉，就不会过上好生活。

【报刊文章】

康熙与教皇使者的一次交锋¹

张国刚（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）

康熙皇帝与路易十四、罗马教皇都有直接或间接的交往。他请路易十四多派传教士来华，请罗马教皇允许传教士遵照利玛窦规矩继续留在中国。

17世纪末叶，耶稣会内部正为中国礼仪之争，闹得不亦乐乎。核心内容是，中国教徒可以祭祖祀孔吗？康熙也被带进去了，为此还与罗马教皇及其使节有一次激烈的交锋。

徐日升、张诚、白晋等在华传耶稣会士，是曾经帮助大清朝与俄罗斯签订《尼布楚条约》的功臣，也是康熙皇帝在天文、历法、数学等自然科学上的老师。他们焦心于罗马教皇对于其在华传教事业的干预，特请示康熙帝关于中国礼仪的问题。这个问题是，请皇帝证明，中国人祭祖祀孔之礼仪，无关乎宗教信仰。康熙慨然应诺，特颁发谕旨，确认耶稣会士理解正确。此谕旨被翻译成拉丁文，送到梵蒂冈，教皇大怒：我们宗教事务，岂容一个异教君王判断！并派出特使铎罗到中国去检查教务。

铎罗1705年4月到达广州，同年12月14日抵达北京，12月31日首次觐见康熙皇帝。虽说是礼节性的，但双方为一些人事问题有不同意见。铎罗提出在北京设立总主管，管理全体教士。康熙当时没有答复，后来答复说，这位宗教事务主管，必须从在宫廷中服务了10年以上的传教士中选择。这不符合罗马教皇的意图，教皇之意要夺回在华传教的主导权。康熙提出在铎罗使团中选一人出使罗马，以报聘教宗。铎罗推荐的人选，康熙也已同意，后来发现此人不通中文，提出由宫廷耶稣会教士白晋为正使，铎罗推荐的人为副使。白晋曾撰写《康熙传》，深得皇帝信任。对此，铎罗很是不爽。由此可见，康熙意识到不通中文，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传教士，很可能会坏了大清与西方关系。

半年多以后，即1706年6月29日，康熙第二次接见铎罗，对于铎罗的目的已经有所警惕。康熙很关切教皇对他那道谕旨有什么回应。铎罗支支吾吾，不愿意正面回答。康熙不得要领，邀铎罗次日游览畅春园。

次日，即6月30日，在畅春园会面。康熙开门见山警告特使，不要干涉中国人的习俗，天主

¹ 本文刊载于《南风窗》2016年1月27日-2月9日，第3期，第101页。



教须与儒学和谐共处，若反对祀孔祭祖，西洋人将很难再留居中国。铎罗无法回避，说天主教与儒学之间的冲突，他本人没有能力解释，福建宗座代牧阎焯，精通中国文献，可作详细解答。

阎焯是法国人，主持福建教务，不满葡萄牙耶稣会士在华垄断地位，此时奉铎罗之命早已来到北京，并被要求从儒家经典中摘录出，他认为与天主教相抵触的内容。阎焯硬着头皮从“四书”“五经”中摘录出一些章句，分列为48个命题，说儒家“太极”或者“理”不可能指天主教的神，中国皇帝祭祀天地、星辰、山岳等行为与天主教相抵触。

康熙特地在热河召见了阎焯。阎焯摘录的文字，错误百出，康熙断定，阎焯完全没有能力解释中国书籍。现在他要当面测试阎焯，看看他对“四书”的熟悉程度，并指着御座后的几个汉字，要阎焯识认。阎焯只会讲几句福建方言，既不能从“四书”中翻出皇帝要求的内容，几个汉字也只认得一个，见驾时全靠翻译。

这水平与康熙身边的传教士，差别太大了。康熙指斥阎焯“愚不识字，擅敢妄论中国之道”。说阎焯不谙中文，却把不伦不类的译作发往欧洲，导致教宗误解中国教义。阎焯辩称他的中文的确不够熟练，但儒家经典也的确有不符天主教之处，他挑出这些内容寄给教宗，是将疑难问题都提交教宗裁定。

阎焯这种冥顽态度，使皇帝不再有容忍之心，于是很快就下令驱逐他。皇帝同时通知留在北京的铎罗，他的国家里不需要任何唱反调的传教士。康熙命各地传教士进京接受审查，发誓永居中国，发誓遵从利玛窦规矩，即尊重中国文化和风俗，否则，请立即出境。

这次的事件后来愈演愈烈，到雍正、乾隆时期发展成为一场禁教活动。就当时的情形而论，康熙最后的处置，虽然有简单化之嫌，但维护中国传统的态度，亦无可厚非。罗马方面干预在华教务，夹杂着权力与利益考量，难辞其咎。设想当年佛教在中土的传播，如果“娘家人”也如此的颯颯干预，恐怕也会中途夭折的。

【报刊文章】

从难民村看在印藏民困境

《参考消息》2016年4月3日第8版

【本刊讯】在新德里北部亚穆纳河边上有一个名叫马吉努卡提拉的地方，1960年印度政府批准在此建立一个西藏人难民村，迄今为止已有56年历史。现在这里居住着大约1万名藏人。当地藏民主要靠买卖中国商品为生，生活十分困苦，而他们在得不到当地公民权的同时，还要经受“藏独”势力严密监视，不少人希望返回中国生活。

今年60岁的朗葛在这里生活了多年，经营一家卖食品香烟的小店铺，小商品大多来自中国。他老家在中国云南，最近他把店铺转让给了别人并打算回国。“在这里20多年，生活没有任何改变，也就是这家店铺可以卖点钱，我打算回老家做生意，”朗葛对记者说。

这里的经济社会状况日渐萧条，许多店铺关了门。像朗葛这样长期生活在印度但计划回家的藏人不在少数。他在这里算是中层藏人，不算贫困者，但即使这样也收入很少。而随着西方游客减少、治安日益恶化，他的店铺也难以维持。他一再提醒记者，小心小偷啊，当地人很坏啊。

在一家新开的服装和旅游鞋店里，店主对记者说，这里的衣服和鞋子全部来自中国，他与国内商家有定期供货关系，顾客主要是藏人。一名叫梅朵的商店经理说，她来自甘肃，因为有亲戚在印度，三年前来到这里，但这些亲戚多数十分贫穷，她从国内带了钱来做生意，想等以后赚了